

發 刊 辭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思想的容器，也是人類組織社會，發展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對以中國為中心的古東亞文明來說，語文更佔中心性的地位：西方觀念中的 culture，原義起於農耕，而國人稱之為「文化」，西方所謂 civilization，字原出於城邦（civitas），我們則名之曰「文明」，二者都離不開一個「文」字。顯然，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之中，農耕和城邑固然重要，但其究竟意義到底還不能夠和教育、政治賴之以推行運轉的語文相提並論。古希臘有普羅米修士（Prometheus）為人類自奧林匹克山上盜火種而受刑的神話，我們的傳統中則有倉頡造字而鬼夜哭的說法。這兩個故事，可以說是西方和東方對人類如何從茫昧混沌之中掙扎出來，成為萬物之靈的兩個不同解釋。它們顯示了西方文明與技術之間，和東亞文明與文字之間，各有其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這可以說是兩種不同文明發展模式的象徵。

十九世紀以還，西歐諸國挾持船堅炮利的優勢向東亞擴展，中國始而在軍事、商業、外交上受猛烈衝擊，繼之在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也發生了驚天動地，亙古所未有的鉅變。鉅變的一個高潮，無疑就是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這個運動的重要性不單止於以通俗的白話文代替了典雅的文言文，從而創立活潑生動的新文體和新文學，更在於將國人的頭腦從傳統觀念的牽制、規限解放出來，讓它能夠吸收前所未曾夢見的新事物，向前所難以想像的新方向發展。新思想、新文化，須以新文詞、新語法為車載，才有力量自由馳騁於新天地、新世界之中，那是沒有疑問的。對我們這個「道須文載」的「文字之邦」來說，白話文的興起，從長遠看，無疑是和周公制禮或者辛亥革命有同樣劃時代意義的。

然而，白話文運動還只不過是中國語文變革的序曲而已。接踵而至的，是從二十年代以來隨著大量西方和東洋譯著湧進的無數新詞彙、新概念，以及新而駁雜的語法、句法，是從五十年代開始在大陸正式推行的漢字簡體化，和政府一直在鼓吹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七十年代以來教育普及和電子傳媒日益籠罩人類官感、意識這些大形勢下，社會上大量錯、別字和生硬語句、公式化文章的湧現。到今天，白話文已經度過七十周歲了。回顧過往這波濤洶湧、風雲變幻的七十年，我們一方面佩服和慶幸它強韌不屈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不免為它所依附的文化土壤日受侵蝕，為它所呼吸的時代空氣日漸變質，而深深感到憂懼吧？

在今日，作為「後工業文明」(post-industrial civilization) 特色的電腦、電視、國際電傳，正在急速地、無可抗拒地從最基本的層面改變人類的思維和溝通方式。如麥魯恒 (Marshall McLuhan) 在十多年前所指出，塑造人類意識的環境，已不復是千百年來大家熟悉的字句、書本，而是傳訊率高、內容豐富、變化無窮，能在瞬息間網絡全球的電子媒介；全世界現在已經變成一條「電子村」了！這由電子媒介所帶來的訊息氾濫，無疑對所有現代語文都在產生不斷的衝擊，從而令它們的結構、發展規律乃至文化上的地位產生基本變化。至於這變化的終極究竟何在，可說是誰也無法預測的。面對這個空前的威脅，無疑是所有現代語文的共同問題，共同命運。

可是，在必須面對這威脅之前，意大利文和英文已從容發展了六百多年，俄文也最少發展了二百年：它們在現代社會的突破來臨之前就已經成長了。相形之下，在過去這混亂動盪的七十年間醞釀、發展出來的現代中文，還只不過是處於少年時期而已。一方面它是十億中國人每日談情說理，探天究地，經商興訟，乃至縱橫捭闔，折衝樽俎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根基未固，規範未立，卻又必須立刻就面對急速猛漲的時代洪流。陶公所謂「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殘，根株浮於海」，正好作為中文當前嚴重危機的寫照。思念及此，中國知識分子當不能無動於衷吧？

在香港，中文所遭遇的問題基本上和大陸、臺灣是一樣的。但由於英語的強勢，粵語的普遍應用，以及社會受傳播媒介影響特深，因此許多問題顯得更為尖銳、普遍、嚴重，也引起更多激烈爭論。語文關係到社會上每一個人，它並不是可以由少數學者專家來指導或者左右的。但這並不等於說，語文的發展只能盲目、漫無方向地跟隨一般人的口味、傾向，作布朗式的隨機運動。在現代，語文的文化功能比從前固然已經減輕了，但畢竟它還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我們思想、溝通、定規立約的工具。語文不明確流暢，豐富有力，我們的一切工作、活動就會受到掣肘，失去效率。所以，我們認為，語文學者和應用者都有責任經常研究和討論社會通用語文的發展趨向，以及由之而產生的種種問題，並提出他們的見解來，喚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和反省。對今日面臨危機的中文來說，這種需要顯然特別迫切，這就是中國文化研究所決定創辦這一份《中國語文通訊》的原因。

這份「通訊」並非純粹學術刊物，也不是行業性的消息雜誌，或有關語文的消閒讀物。它的目的，在於從學術角度，對社會上的中文應用提出意見，並且為學者和語文工作者提供一個討論中文規範和發展方向的園地。我們熱切希望教授、教師、記者、編輯、作家、乃至一般人都會在這裏發出聲音，提出意見，共同為豐富、充實和改進我們日日寫、日日講、時時刻刻用之以道情達意、思考立論的中文而努力。這份通訊雖然在香港辦，並且暫時以香港所感到迫切的中文問題為中心，但中文是沒有地域限制的，我們希望除了本港之外，它還能逐步在大陸、臺灣乃至海外華人之間吸引作者和讀者，成為所有應用和研究中文者的刊物。

這，自然還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希望。但我們很高興，海內外許多知名的語文學者都已經允諾出任本刊的顧問，替我們審閱文章了。他們之中，前輩如北京的呂叔湘、周祖謨、朱德熙，本港的饒宗頤（亦是本所的）、羅忼烈，臺灣的周法高諸位教授，年輕一輩的如丁邦新、陳新雄、梅祖麟、詹伯慧諸位教授，翻譯界的行尊如高克毅、宋淇、思果等三位先生，都是地位崇高的學者專家。得到了他們的鼓勵和匡導，我們深信只要肯努力耕耘，只要能用心體會廣大讀者的需要，那麼創辦這份刊物的希望是可以達到的。

中國一百五十年來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所遭遇的巨大困難，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最近兩、三年，似乎已漸漸露出解決的曙光了。但同一時代中國在文化、思想上所面臨的空前危機則似乎還在加深、轉劇。中文目前所面對的許多衝擊、疑難，從根本上說，並不是孤立的，而正是這整體危機的一個表徵。我們關心、思索「中文往何處去」這一問題，同時也就是間接地面對「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個更大、更長遠的問題。我們希望，這份小小的刊物，能引起讀者對「中文往何處去」這個迫切問題的注意和討論。